

「家庭參與及商校協作」： 培育學生面對挑戰的希望感¹

何瑞珠*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

李文浩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李仕傑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

中學生踏入高中階段前後，要面對不同挑戰，而香港學生面對的學習壓力嚴重，升學競爭尤為激烈。若學生缺乏面對挑戰的素質，容易失去解決問題的目標和動力，更甚的是對未來失去希望感（hope）。這對於缺乏社經資源和家庭支援的基層學生來說，尤其值得關注。香港目前透過家庭參與和「商校協作」模式，舉辦或資助不同活動，推動學生的個人發展。本研究於 2015 年收集了 5,500 多位曾參與香港一項「商校協作」計劃的中學生的問卷數據，並以多元迴歸模型分析方法，探討學生的個人及家庭背景因素（性別、出生地、家庭結構及社經地位）、父母的期望和參與，以及參與「商校協作」活動，對學生希望感發展的影響，研究發現父母的期望和參與以及學生參與商校協作，對中學生的希望感具顯著正面影響。本研究就身處弱勢階層的青少年透過參與各類「商校協作」活動，對個人面對未來的正面素質——希望感的影響作實證剖析，結果將對青少年政策如何拓展企業及社區的社會資源有具體啟示。

關鍵詞：家庭參與；商校協作；弱勢學生；正向心理學；希望感

* 通訊作者：何瑞珠（estherho@cuhk.edu.hk）。

研究背景

學生踏入高中階段前後，需要經歷連串影響個人未來發展的改變，諸如選擇學術專業、應考公開試以求取資歷、決定中學畢業後出路，這些都使他們逐漸邁向成年人的世界。他們在這階段開始了解自我志向、萌生個人目標，同時要面對現實生活愈加複雜的限制和挑戰。部分能夠調適這種矛盾的學生會建立人生的方向，對前景充滿希望，但部分未能應付的學生會沮喪及放棄，更甚者是對未來感到絕望。

除了加強在社會、家庭、學校教育等方面的支援，更值得思考的是如何提升學生面對挑戰的希望感。來自基層家庭、支援及資源相對較少的學生，尤其值得關注。近年香港的教育改革措施中，「商校協作」這種社區參與模式開始受到關注。其中一項主要以扶助缺乏發展條件的學生為目標的「商校協作」計劃，透過資助及舉辦多元化活動，給予學生培訓及啟發，以迎接未來發展和挑戰。可以預見，這種社會參與模式將有相當可觀的發展。為此，本研究期望了解參與相關活動有多大程度能提升中學生面對挑戰的正面素質和對前途的希望。

文獻回顧

關注青少年發展的早期研究普遍着眼於成長期間的心理和行為問題（例如壓力、情緒和精神病患、自殺及自毀行為等），並嘗試判定及防止相關的潛在風險因素（社經背景、性格特徵、朋輩影響、生命中的重要改變等），較少關注個體是如何正面面對挑戰。有見及此，正向心理學者提倡從人的心理情緒和素質着手，嘗試培養並發揮個體的優點或潛能，適應生命改變及挑戰，以達至個人成長（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希望感——青少年發展的重要構念

「希望感」（hope）是近年正向心理學中學者廣泛研究的一個心理素質。希望感不單是對美好事物如願發生的主觀期許（Snyder, 1994），亦是達成個人目標的「認知—動機」歷程（cognitive-motivational process），當中包含兩個元素：（1）認知層面，具較高希望感的人自覺能夠找到達成目標的行動途徑（pathway），並且在選擇途徑的過程中保持靈活，即使一種方式不奏效，亦能思考不同方法解決困難和達成目標；（2）動機層面，具較高希望感的人有持續向目標邁進的能動力（agency），即使遇上困難或挫折亦能自我激勵，解決問題。Snyder 及其團隊建立希望感量表時，透過統計結果確認兩者為獨立元素，但互為表裏（Snyder, Harris, et al., 1991）：假設有決心達成目標，會更積極尋找途徑並行動；而找到實踐途徑亦會加強人達成目標的動力。

這種同時強調「認知－動機」以達成目標的特性，使希望感從其他正面心理素質（如自我效能感、樂觀態度）區分開來（Snyder, Harris, et al., 1991; Snyder, Shorey, et al., 2002）。²

過去二十多年，希望感這項心理素質吸引了大量心理學、教育學、輔導學學者及工作者關注，其測量工具亦廣泛應用到相關性研究（correlational studies）之中。研究發現，希望感能預測個體的學術表現（Snyder, Shorey, et al., 2002）、運動表現（Curry, Snyder, Cook, Ruby, & Rehm, 1997）、精神健康（Marques, Pais-Ribeiro, & Lopez, 2009）和生活滿足感（Marques, Pais-Ribeiro, & Lopez, 2011），以及較低程度的抑鬱（Geffken et al., 2006）和焦慮情緒（Chang & DeSimone, 2001）；反之，具較低希望感的青少年傾向參與高風險的行為，例如暴力行為和濫藥等（Bolland, 2003）。基於以上種種，學者普遍視希望感為青少年正向發展的預測因素（predictor）和保障因素（protective factor），認為培養青少年的希望感能協助他們迎接成長上的各樣挑戰。

了解影響希望感發展的重要因素

縱使上述以希望感預測青少年正面行為的研究成果豐腴，但若以希望感本身的發展歷程為焦點，似乎未得到相稱的關注和討論（Callina, Johnson, Buckingham, & Lerner, 2014; Schmid & Lopez, 2011），於針對華人社會青少年群體的論述更是著墨不多。

Callina et al. (2014) 一項以美國 7 至 10 年級青少年為對象的追縱研究，是少數開宗明義討論青少年希望感發展過程的研究。他們認為以往研究過於簡化地將希望感視為獨立的（individualistic）特質，忽略了這個心理素質與個體成長環境的生態特質（ecological assets）之間的關係。一如他們參照 Schmid & Lopez (2011) 青少年正向發展（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框架所述，個體於成長期間，希望感和其他正向心理素質及行為的發展，其實是「個體－處境」（person-situation）互動和不斷調節的過程。換句話說，當青少年面對成長上的問題或挑戰，能否保有能動力並掌握有效途徑以達到預定目標，除了視乎他們個人的能力和心理素質外，亦相當視乎他們生活環境的生態特質，比如他們有多少可用以解決困難的資源（access to resources），或是其人際網絡（social networks）中可以提供的可靠支援及意見等。這跟 Ng, Chan, & Lai (2014) 報告一項針對香港弱勢家庭兒童希望感與生活滿意度研究的角度類近。他們引述 Fleeson & Nofle (2009) 指出，了解青少年心理素質的發展，需要關注他們生活的「就近情境」（proximal context）如何對他們產生影響，並將種種影響希望感發展的因素歸類為「內在資源」（internal resources，如青少年個人能力及心理優勢等）和「外在資源」（external resources，如身邊人的支持）。縱使用詞不盡相同，以上模型或

理論均清楚說明，研究青少年的希望感發展需要注意情境 (contextualized)。以下部分將梳理過往研究發現影響青少年希望感發展的各種個人及環境因素。

家庭社經地位

當青少年要尋求動力和途徑達至成長階段的目標時，家庭是提供支援的最就近社會情境。普遍相信，家庭收入、父母工作和教育水平等反映社經地位的因素，會直接影響青少年所得支持的質與量，這不單指金錢及物質資源，還有文化及社會資本 (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但尚未見實證研究有系統地辨明各項社經背景因素對青少年希望感的影響，而目前研究傾向聚焦於社會上的弱勢社群。例如美國不少研究關注國內拉丁裔 (Cavazos, Johnson, & Sparrow, 2010; Ojeda & Flores, 2008; Vela et al., 2014) 和非裔、亞裔等移民 (Chang & Banks, 2007) 青少年的希望感水平。這些研究普遍假設移民家庭是被邊緣化的少數群體，往往較大機會面對貧窮、語言及文化隔閡、歧視等問題，使在這些家庭長大的青少年在發展上面對較多阻礙，因而減低追求目標的動力和途徑。然而，研究結果並未有一致結論。例如，Vela et al. (2014) 以父母教育程度為預測希望感的因素，發現只有母親教育程度呈顯著影響；而 Chang & Banks (2007) 比較不同族裔的希望感，卻發現拉丁裔移民家庭大學生在希望感 (能動力副量表) 方面比白人及其他族裔為高，兩位作者推斷少數族裔群體緊密的凝聚力及支援網絡等能提供補足作用。又有學者研究美國墨西哥裔高中學生的未來教育想望，發現學生會以父母較低的教育水平 (Ojeda & Flores, 2008) 及低收入工作 (Cavazos et al., 2010) 為推動個人努力達至高等教育目標的動力。由於未能確定上述研究結果是否適用於不同文化及地區的社會設定 (如貧富分布、社會流動機會等)，社經背景因素的影響值得再作進一步研究。

性別

Nurmi (1991) 探討青少年如何看待個人未來，指出性別的影響需要仔細考慮，特別是社會對男女所賦予的角色期望相當影響青少年對個人未來目標的想法，例如男性較女性會更多思考未來且想得較長遠，這很大程度受不同文化及家庭觀念影響。可是，Snyder 在建立希望感量表時，發現男性和女性的希望感水平並未有顯著差異 (Snyder, Lopez, Shorey, Rand, & Feldman, 2003)，而其他研究曾將性別納入為希望感的影響變項，亦未有發現性別差異 (Otis, Huebner, & Hills, 2016)。因此本研究團隊認為值得將性別納入本研究當中。

家長的參與及期望

希望感的發展很大程度是個社會化過程 (socialization)，而這過程最先且最主要出現於父母與子女之間 (Snyder, Hoza, et al., 1997)。Nurmi (1991) 從三方面說明父母在這方面的影響：(1) 父母培育子女成長的過程中，直接或間接地為他們建立起價值觀、興趣和成就取向等標準，如是者青少年如何釐訂和排列學業、工作及個人嗜好等目標優次，均與父母本身的方式相近；(2) 父母本身如何解決不同的挑戰和問題，例如如何規劃事情或應對生命逆境，都成為子女的學習楷模，透過示範和傾談能協助子女掌握解難技巧；(3) 父母對事件的歸因方式 (attribution) 影響子女對未來情況及個人行為的評估，以及判斷個人能否有效建構目標和實踐規劃。有學者集中研究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行為，發現父母的參與行動對青少年的希望感發展有幫助。例如，Nurmi & Pulliainen (1991) 一項針對 15 歲青少年的研究，發現父母適當地管制子女的行為有助青少年逐步達到目標，而與子女討論亦能提升子女的正面想法並對未來抱持希望。McCabe & Barnett (2000) 亦發現，家長明確地與子女談論未來目標 (如長大後的事業方向)，能令子女更清楚自己未來所要達成的目標。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結果均以西方社會為背景，有關家長的參與及期望對華人社會有否另一指向及影響，例如「望子成龍」的傳統期望 (Leung & Shek, 2011) 在子女面對未來時是帶來壓力還是幫助，需要進一步探討。

「商校協作」——透過社區參與支援學生面對挑戰

上文按照青少年發展的處境，根據以往研究所得，梳理出各項影響青少年希望感發展的個人及環境因素。此外，社區資源亦漸漸成為青少年發展其中一種重要的外在資源 (Ng et al., 2014)。除了金錢上的資助補貼和實際的支援服務，社區內的持份者還可透過與學校進行不同形式的協作，為校內的青少年提供協助。在香港，大學、非牟利機構和慈善團體屬學校協作的對象已有相當歷史，而近年「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意識逐漸普及，商業機構亦開始從以往捐款這單一模式邁開腳步，嘗試開拓與學校協作的可能 (黃顯華、韓孝述、李文浩，2012)。

2011 年，「學校起動」計劃 (下文簡稱「起動計劃」) 由香港一個商業集團 (下文簡稱集團) 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合作開展，是本地最具規模的「商校協作」行動。「起動計劃」成立的宗旨是為具潛力但欠缺學習條件及優勢的中學生提供支援，啟發他們規劃人生，為未來發展做好準備。在具體實踐上，集團所提供的資金和在香港企業間所發揮的號召效應，使主要錄取第三組別³學生的成員中學獲得不同資源和機會，籌辦各類有助學生全人發展的項目。其中一類旨在幫助學生從現實職場及社會體驗中，拓展對未來職業及個人發展的路向，研究並證實它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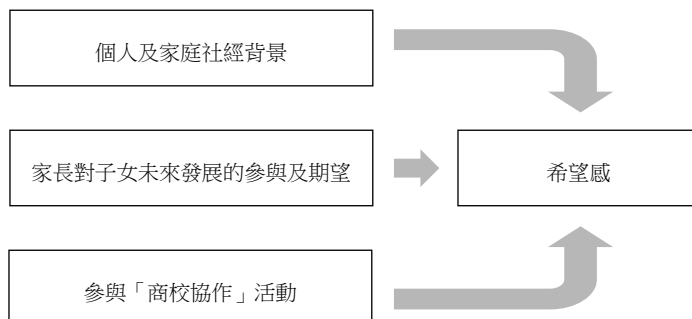
協助參與學生掌握升學及就業的技巧（何瑞珠、姜培芝、楊鎮偉、李文浩，2015）。此外，學校能運用所得經費，按照學生個人成長需要及興趣全數或部分資助學生參與不同類型活動，包括體藝課程培訓、境內／外考察及服務學習、觀賞及參與文娛活動等。這些多元化活動的最大特色，是按照學業成績及社經地位較低學生的需要設計，並以建立品格、促進學習、拓展視野、建立自信為目標。以一系列體驗式學習活動為例，安排學生於現實場景解決具體問題（如透過賣物會向公眾推廣社區共融、為偏遠地區人民提升生活素質），強調提升學生解決困難的技巧和內在素質；又安排社區人士及持份者（如企業員工、大專學生）成為學生的夥伴，在他們的學習過程中作出指引及啟導，擴闊學生的支援網。借 Fleson & Nofle（2009）的詞語來描述，這些「商校協作」活動的作用，就是在學生本身成長的「就近情境」以外提供機會，增加他們的「內在資源」和「外在資源」以面對困難，提升他們的希望感。

「起動計劃」標誌着「商校協作」這種社區參與模式正式在香港大規模實施。目前「起動計劃」更利用商界網絡號召更多企業、大專院校及各類型機構加入與學校協作的行列，⁴ 從各方面協助基層家庭青少年的發展。時值這種「商校協作」模式開始得到關注和擴展，值得提出的是，這種模式的支援對協助提升青少年的希望感以面對未來挑戰有何影響？這影響相對於以上文獻回顧提到種種影響希望感的個人及環境因素的影響又如何？這對於日後運用社區和企業資源以推動青少年發展工作有重要意義。

研究框架及問題

承接以上文獻回顧，本研究以量化方式調查受訪學生的個人及家庭社經背景、家長對子女未來發展的期望及參與、參與「商校協作」活動的狀況，再將收集得的數據以多元迴歸模型分析方法，探討各個變項對受訪學生希望感的相對影響。本研究將按照圖一的框架進行探討。

圖一：研究架構



根據以上架構圖，本研究設定以下三個主要研究問題：

1. 就個人及家庭社經背景、家長的參與及期望和希望感所反映，受訪學生的發展處境如何？
2. 個人及家庭社經背景、家長的參與及期望對學生的希望感有何影響？
3. 相對於上述各項因素，學生參與「商校協作」活動對其希望感有何影響？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香港 13 所參與「起動計劃」的中學裏就讀中三至中六的高中學生為研究對象。這 13 所學校全屬第三組別學校，在參與計劃時經過一系列條件甄選，因此學校背景相當同質：所有學校均為政府津貼學校，位處公共屋邨或市郊，所取錄學生來自低收入家庭等；但沒有集中於某些辦學團體（3 所隸屬天主教區，3 所隸屬佛教辦學團體，其餘隸屬不同慈善團體或獨立辦學團體）。本研究抽取樣本總人數為 6,037 人，收回有效問卷 5,506 份，回收率達 91%。有關學生背景資料，詳見「研究結果」下第一節。

數據收集過程

本研究於 2015 年 1 月至 4 月期間向參與學校發放紙本問卷，並指引校內教師於上學時段安排約 40 分鐘給學生填答。填答前，發卷教師會向學生講解研究背景及守則、參與者權利和填答指引。若學生作答時遇上困難，可向在場教師尋求協助。部分學生因缺席無法完成問卷，而因破損或作答模糊的問卷作廢。

研究工具

因應抽樣對象均就讀中文中學，所有問卷題項均以漢語編寫。問卷編製流程如下：經由研究小組會議討論研究焦點和題目，然後邀請中學生對問卷初稿進行預試，刪除提問內容不清或鑑別度不佳的題項。從研究對象取得數據後，以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測量各量表的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經因素轉軸分析，從因素分數矩陣中依據量表不同題項在某一特定因素的負荷量大小來判斷題項歸屬的層面。本研究的變項包含四大類別，下文分別說明其操作定義和內涵。

個人及家庭社經背景

1. 受訪學生個人資料，包括性別、出生地、家庭結構。本研究以虛擬變項方式進行分析，將「女生」、「內地出生」、「單親及無父母家庭」訂為 1。
2. 受訪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利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萃取父母最高教育程度、父母最高職業地位和家庭收入變項的得分，成為一個標準化的指數，用以反映受訪學生所屬家庭社經地位的指標：
 - 父母最高教育程度——指父母（或監護人）完成的最高教育程度，由學生分別按照父親（或男性監護人）和母親（或女性監護人）的學歷，從「學士或以上」、「大專（非學位）」、「文憑／證書課程」、「中七畢業」、「中六畢業」、「中五畢業」、「職業訓練課程」、「中三畢業」、「小學畢業或以下」選填一項。本研究將不適用的選項排除在外，不列入分析。在建構「家庭社經地位」時，只納入父母兩者中較高的教育程度，並轉換成教育年數計算。
 - 父母最高職業地位——參考曾榮光（2004）編製的職業分類列表及 2009 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問卷中父母職業題項。職業類別按掌握知識和社會地位分為九個等級，分別為「基層職業」、「機械設備操作員及裝配工」、「技術員及有關行業工人」、「漁農業及林業技工」、「服務員及售貨員」、「文員支援人員」、「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專業人員」及「行政管理人員」。至於「照顧家庭」、「退休」及「不適用」等選項，本研究把它們排除在分析之外。由學生自行填寫其父親及母親現時或最近從事的職業；同樣，將父母兩者中較高的職業地位納入「家庭社經地位」變項。
 - 家庭每月總收入——本變項依每月收入多寡分為九個等級，幅度由 \$5,000 以下至 \$40,000 或以上。

學生參與「商校協作」活動的情況

本研究收集受訪學生參與「商校協作」活動的情況。由於經「起動計劃」舉辦或資助的活動繁多，為方便統計，本研究將活動歸納為 15 個範疇，並需要受訪學生回顧由 2011 年 9 月至填答當日參與每項活動的次數。每題設有四個選項，分別為「0 次」、「1 次」、「2 次」、「3 次或以上」。為方便分析，研究小組利用主成分分析萃取一個變項，以反映受訪者參與上述活動的多少。經轉軸後的因素分析得出三個主因素，因素負荷的範圍界乎 .388 至 .859 之間，按題項的意義歸納為：「校本學生活動」、「體驗式學習活動」和「升學就業活動」三類。

家長對子女未來發展的期望及參與

本研究採用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香港青少年追蹤研究測試——學生問卷」的題項，測量受訪學生感知家長對其個人未來發展的期望及參與。「家長期望」部分採用 Wang & Heppner (2002) 研發的「符合父母期望量表」(Living up to Parental Expectation Inventory) 其中 6 個題項，要求受訪學生按六點李克特量表 (Likert Scale) (1 = 「完全不期望」, 6 = 「十分期望」) 對題項 (例如「父母期望我的學業成就令他們引以自豪」) 評分，並透過因素分析萃取一個因素為變項，以反映受訪學生感知父母對其個人未來發展的期望高低。

「家長參與」部分共有父母參與子女未來發展的 6 項行為 (例如「父母鼓勵我選擇任何我想從事的職業」)，要求受訪學生標示父母「有」或「沒有」透過所述行為參與自己的發展抉擇。本研究將受訪者標示「有」的父母參與行為加總並統一化為變項，以反映受訪學生報告父母對其個人未來發展的參與程度。

希望感

本研究採用 Snyder, Harris, et al. (1991) 研發的「希望感量表」(Hope Scale) 測量受訪學生的希望感。量表作者在不同樣本進行檢定，確認量表適用於 15 歲或以上人士。本研究參考何敏賢為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2010) 所進行一項調查的中文翻譯版，4 題量度達至目標的能動力 (agency) (例如「我能達到自己定下的目標」)，4 題量度達至目標的行動途徑 (pathway) (例如「我能想出很多方法去獲得生命中對我重要的東西」)，受訪者按四點李克特量表 (1 = 「十分不似我」, 2 = 「有點不似我」, 3 = 「頗似我」, 4 = 「十分似我」) 對題項評分。根經因素分析結果，本研究捨棄兩題負荷量不良的題項，將其餘六題荷載到一個因素的結構。所得變項用以反映受訪者的整體希望感，亦成為本研究的主要依變項 (dependent variable)。

信度分析

在信度方面，本研究計算信度指數 (Cronbach's alpha) 以檢測以上量表，保證測量結果具有一致性和穩定性。信度分析結果為：「商校協作」活動中「校本學生生活動」(.79)、「體驗式學習活動」(.79)、「升學就業活動」(.72)；父母對個人未來發展的參與 (.77) 及期望 (.87)；希望感 (.80)。上述指數均顯示各變項具有滿意的信度。

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 SPSS for Windows 中文 21.0 版進行資料處理及分析。當回收正式問卷後，本研究的分析步驟如下：首先利用敘述統計描述樣本結構和變項，然後利用多元迴歸模型分析方法探討受訪學生的個人及家庭社經背景、父母對個人未來發展的期望及參與、參與「起動計劃」各類型活動對學生希望感發展的影響。

研究結果

受訪學生個人及家庭背景

本研究以參加「起動計劃」的香港 13 所中學就讀中三至中六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各級學生比例為中三（26.6%）、中四（24.8%）、中五（24.4%）及中六（24.1%）。當中男生（52.7%）多於女生（35.6%），但有 11.7% 學生沒有填答性別資料。內地出生和本港出生的學生比例分別佔 32.1% 和 55.3%，餘下 12.6% 的學生則於其他地方出生或沒有出生地資料。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2012）公布的 2011 年人口普查數字，顯示 77.8% 的香港適齡全職學生於本地出世，可發現本研究的對象於內地出生的比例較全港整體學生群體為高。在家庭結構方面，大部分受訪學生主要與父母同住（64.1%），但亦有 26.3% 學生是來自單親家庭（22.3%）或無父母家庭（4.0%），其中單親家庭以與母親同住佔多數（16.4%）。至於受訪學生的社經背景方面，學生父母的最高教育程度主要為中三（20.7%），其次為中五（12.4%）；而學生父母現時或最近期從事的職業則主要是服務員及售貨員（18.4%），其次為基層職業（17.1%）（例如清潔工人、雜工、搬運工人、保安員等），技術員及有關行業工人（11.2%）。至於家庭每月總收入主要介乎 \$10,000–14,999（22.2%）、\$15,000–19,999（15.6%）、\$20,000–24,999（12.7%）。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3）扶貧委員會對本地貧窮線的定義及 2012 年公布的數字，顯示 15.2% 的香港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若利用家庭每月總收入的變項計算，本研究的受訪學生家庭大約有 42.4% 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由此可見，受訪學生的社經地位相對較低，家庭的經濟條件比一般香港學生較為薄弱。另外，於上述三項社經地位指標沒有作答的比例佔 20% 至 30%，可見部分中學生未必知道父母的教育程度、職業和收入。

家長對個人未來發展的期望及參與

表一顯示受訪學生感知家長對他們在升學和就業上最大的期望是「努力讀書，將來找到高薪的工作」（平均值 4.64），其次為「學業成就令父母引以自豪」（平均

表一：受訪學生感知家長對其未來發展的期望

	平均值*	標準差	填答百分比					
			完全不期望					十分期望
父母期望我努力讀書，將來找到高薪的工作。	4.64	1.28	3.2%	3.1%	10.4%	23.8%	27.9%	31.0%
父母期望我的學業成就令他們引以自豪。	4.16	1.38	5.1%	6.8%	16.5%	30.4%	20.3%	20.3%
父母期望我分擔家庭的經濟負擔。	4.12	1.38	5.4%	7.5%	16.2%	29.1%	23.0%	18.2%
父母期望我光宗耀祖。	3.98	1.43	7.0%	8.2%	18.8%	28.8%	19.7%	17.0%
父母期望我升讀他們理想的課程/院校。	3.78	1.52	10.8%	9.8%	19.2%	26.3%	18.0%	15.4%
父母期望我從事他們理想的職業。	3.66	1.55	12.4%	10.9%	20.1%	25.0%	16.7%	14.3%

* 本量表題項將學生的回應以 1 = 「完全不期望」、6 = 「十分期望」轉化為數值。

值 4.16) 和「分擔家庭的經濟負擔」(平均值 4.12)。在百分比的數據上，受訪學生表示家長期望(六點量表中的第 5 及 6 點)他們「努力讀書，將來找到高薪的工作」佔 58.9%、「分擔家庭的經濟負擔」佔 41.2% 和「學業成就令父母引以自豪」佔 40.6%。對「起勁計劃」中的弱勢家庭而言，子女感到父母有這些期望不難理解。

表二顯示家長在子女未來發展的參與上，一般採取支持態度。最多受訪學生表示「父母鼓勵我選擇任何我想從事的職業」(70.3%)，其次是「當我告訴父母我對某種工作感興趣時，他們贊同我的想法」(68.3%)、「父母和我談論我將來想做甚麼工作」(66.3%) 及「當我憂慮將來就業時，父母會和我傾談」(61.6%)。但值得注意的是，少於一半受訪學生表示父母有向他們「提供關於職業的資訊」(42.9%)。這結果或許反映普遍家長仍缺乏職業方面的資訊，因而間接影響他們對子女就業的輔助。

表二：家長參與子女未來發展的情況

	回答「有」
父母鼓勵我選擇任何我想從事的職業。	70.3%
當我告訴父母我對某種工作感興趣時，他們贊同我的想法。	68.3%
父母和我談論我將來想做甚麼工作。	66.3%
當我憂慮將來就業時，父母會和我傾談。	61.6%
父母告訴我他們希望我將來做甚麼工作。	45.7%
父母向我提供關於職業的資訊。	42.9%

受訪學生參與「商校協作」活動的情況

針對由「起動計劃」所籌辦及資助的活動，學生主要參與「免費參觀主題公園、觀賞音樂會或戲劇」（48.2%）、「義工活動」（47.9%）、「升學資訊或諮詢服務」（47.9%）、「職業資訊或諮詢服務」（44.7%）、「參觀業務集團旗下商業單位」（31.9%）等活動（見表三）。若以參與次數來看（三次或以上），受訪學生傾向多參與「義工活動」（17.4%），其次為「免費參觀主題公園、觀賞音樂會或戲劇」（11.6%）、「升學資訊或諮詢服務」（10.8%）和「職業資訊或諮詢服務」（10.1%）。另外，各類「體驗式學習活動」的參與人數百分比比較低（2.6%至8.0%），原因是這類活動需要參與學生於一段時間內（例如兩星期至個半月不等）作沉浸式學習，時間和資源投入都相當高，活動本身亦因此為參與人數設限。

表三：受訪學生參與「商校協作」活動的情況

	1次	2次	3次或以上
校本學生活動			
免費參觀主題公園、觀賞音樂會或戲劇	24.1%	12.5%	11.6%
義工活動	18.0%	12.5%	17.4%
團隊建立活動	16.5%	4.4%	3.4%
補習班或其他學科學習訓練活動	15.9%	7.8%	8.0%
領袖訓練活動	13.8%	4.3%	4.1%
受資助的境外學習及交流活動	12.8%	4.7%	2.5%
於各商業單位舉辦的活動中表演	10.8%	4.9%	6.3%
創意、藝術培訓課程或比賽	8.1%	4.2%	4.5%
體驗式學習活動			
「趁墟做老闆」展銷會（於實際市場環境營商的學習活動）	6.1%	1.6%	0.3%
職場體驗影子計劃（於真實工作環境進行沉浸式學習）	6.1%	1.1%	0.5%
無止橋學習服務計劃（到中國內地落後地區作服務學習）	1.5%	0.7%	0.4%
升學就業活動			
升學資訊或諮詢服務	24.4%	12.7%	10.8%
職業資訊或諮詢服務	22.2%	12.4%	10.1%
參觀業務集團旗下商業單位	18.5%	7.7%	5.7%
學長或導師計劃	11.0%	4.7%	3.8%

受訪學生的希望感

表四顯示量度希望感的六個題項的平均值。各題項的平均值均高於2.5，其中最高的是受訪學生自覺「過去的經歷有助面對將來」（2.85），其次為「能想出很多方法去獲得生命中對我重要的東西」（2.84）和「能想出很多方法走出困境」（2.78）。這

表四：受訪學生的希望感

	平均值*	標準差
我過去的經歷有助我面對將來。	2.85	0.73
我能想出很多方法去獲得生命中對我重要的東西。	2.84	0.73
我能想出很多方法走出困境。	2.78	0.74
即使其他人都放棄了，我知道我仍可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2.67	0.74
直到目前為止，我算是活得頗成功的。	2.63	0.74
我能達到自己定下的目標。	2.56	0.72

* 本量表題項將學生的回應以 1 = 「十分不似我」、2 = 「有點不似我」、3 = 「頗似我」、4 = 「十分似我」轉化為數值。

反映受訪學生在生活上傾向有希望，在找尋解決困難方法上抱有正面想法。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只有一個因子，因此本研究採用這六個題項建立了一個希望感指標。

各項因素對希望感的影響

研究採用多元迴歸模型分析方法，以個人及家庭背景、家長對子女未來發展的期望及參與、「商校協作」活動為自變項，分別探討變項對學生希望感的影響。簡單來說，模式 1 先將個人及家庭背景變項納入分析，逐步於模式 2 加入家長的期望及參與，其後於模式 3 加入「商校協作」活動，以觀察和比較各自變項解釋能力的變化。

表五顯示影響學生希望感的多元迴歸分析結果。以個人及家庭背景四個變項與學生希望感的關係來說，發現社經地位變項對學生希望感具顯著影響，其迴歸係數在三個模式都呈正相關，表示學生家庭的社經地位愈高，希望感愈高。同時，三個模式都顯示女生的希望感顯著比男生低，至於學生的出生地和家庭結構對希望感則無顯著影響。

模式 2 加入了家長的期望及參與變項，兩個變項均呈顯著正相關，其迴歸係數的絕對值 (.159 和 .146) 更高於社經地位和女生的迴歸係數的絕對值 (.078 和 .095)，表示家長的期望及參與除了能提升子女的希望感，其影響更高於家庭的社經地位和學生的性別。

當模式 3 加入了「商校協作」活動變項後，家長的期望及參與的顯著性維持不變，但迴歸係數則有些微下降。就「商校協作」活動三個變項而言，只有「校本學生活動」呈顯著正相關，其迴歸係數 (.071) 同時亦比家長的期望及參與變項的迴歸係數小。這表示參與校本學生活動雖能提升希望感，但其影響則略低於家長的期望及參與。至於體驗式學習活動和升學就業活動對希望感則無顯著影響。決定係數 (R-squared) 在模式 1、模式 2、模式 3 分別為 .022、.077、.084，顯示每當加入新變項，迴歸模型的變異數解釋量均有增加。整體變異數解釋量不高，仍有待改善。

表五：影響學生希望感的多元迴歸模型分析

	標準係數		
	模式 1 個人及家庭背景	模式 2 家長的期望及參與	模式 3 商校協作
個人及家庭背景			
社經地位	.104***	.078***	.078***
女生	-.097***	-.095***	-.104***
內地出生	.019	-.006	-.010
單親或無父母家庭	-.011	.005	.002
父母對子女未來發展的期望及參與			
父母的期望		.159***	.158***
父母的參與		.146***	.139***
「商校協作」活動			
校本學生活動			.071***
體驗式學習活動			.025
升學就業活動			.035

*** $p < .001$

註：遺漏值以配對方式 (pairwise) 刪除處理。

討論及建議

本研究從「個體—處境」的角度切入，探討香港基層家庭中學生的個人及家庭社經背景、家長的參與及期望狀況，以及參與「商校協作」活動相對以上因素對提升香港青少年希望感的影響。研究至少在兩方面具有顯著意義及貢獻。其一在於研究領域，即使過往不少正向心理學研究均有納入青少年希望感為變項，但都多以為之為其他正向成果（如學術表現、生活滿足感等）的預測變項，較少透過實證研究關注這項重要的心理素質受哪些因素影響；本研究承接及延伸少數以希望感發展為焦點的研究，並嘗試探討相關結果能否適用於香港的社會設置及環境。其二，本研究以香港基層家庭青少年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希望感，在本地目前的社會帷幕下饒富意義。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數字和調查結果（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15），近十年貧富懸加劇和社會向上流動機會減弱的情況令人關注，無論是政府、教育界或公眾都發覺需要正視青少年（特別是來自基層家庭者）發展及對未來觀感的問題，原因是假若青少年對未來感到無力和挫敗，短期會對其情緒健康和正向成長產生負面影響，更深遠者則是個體未能盡展潛能和志向、降低社會發展動力，並對社會愈加積累不滿和矛盾。一如上文提及，「商校協作」屬社會參與教育的其中一種模式，在香港開始以扶助社會弱勢群體為目標作有規模發展，有關的支援和資源如何更有效地裝備青少年面對未來挑戰，需要透過實證研究積累知識基礎。

關注基層家庭學生的發展處境

上文報告了本研究對參與「起動計劃」學生所收集各變項的描述性結果。從個人及社經背景因素的幾組數字大概可描繪基層家庭中學生發展處境的側影：例如，約兩成六受訪學生生活於單親或無父母家庭；內地出生學生佔 32.1%，高於全港數字；以家庭收入中位數計算，約四成半受訪學生的家庭生活於政府界定的貧窮線之下。同時，受訪學生感知到家長對其個人未來發展的期望，從題項的回應可見，這些期望主要是透過取得學歷及高薪工作以改善經濟狀況，換言之是爭取社會向上流動機會；近七成家長鼓勵及贊同子女選擇理想的職業，但少於半數能夠提供相關資訊，這或許與家長本身多數從事服務及基層行業有關。

由此可知，受訪學生從家庭所得的發展資源及資訊相對匱乏。縱使如此，希望感量表的結果說明他們對於將要達成的目標仍抱有希望，傾向覺得個人有能力尋求達至目標的方法。這發現跟一般假定弱勢學生對未來態度消極的說法有出入。誠然，本研究單以參與「起動計劃」學校學生為研究對象，抽樣方法未必能反映全港處於基層學生發展處境的全貌，這可視為本研究的限制。但上述單就參與學生的觀察，已足堪政策制定者、教育及青少年工作者和社會上不同持份者重視，並繼續探討不同的支援及資源，扶助來自基層家庭但對未來仍抱正面觀感的學生，使他們有動力和方法面對未來發展的挑戰。

繼續發展「商校協作」，針對學生發展處境提供支援

本研究透過多元迴歸模型分析探討不同因素對受訪學生希望感的影響，結果以下幾方面值得探討。首先，本研究按照「個體—處境」角度，分層納入個人及家庭社經背景（學生成長的生態）、家長對個人未來發展的期望及參與（來自家庭的外在資源）為自變項，結果能夠確認大部分因素對受訪學生希望感的影響方向，與前述海外研究的結果相仿，即在香港的設置中得到佐證。當模式 2 納入家長的期望及參與這類更靠近受訪學生發展處境的變項時，家庭社經地位的影響方向雖維持不變，但影響程度則有下降趨勢，反映社經地位的影響可能部分透過家長的期望及參與對子女的希望感產生影響，而且家長的期望及參與的影響力比家庭社經地位更強。

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商校協作」活動這種社區資源對提升學生希望感的影響，當納入此一變項時（模式 3），整體決定係數有所增加，其中「校本學生活動」變項呈顯著正相關，反映控制了個人及家庭社經地位和家長的期望及參與等因素後，參與校本學生活動有助提升受訪學生的希望感。至於「體驗式學習活動」和「升學就業活動」均呈正面影響但未達顯著程度，其中體驗式學習活動估計與活動參與人數限額有關，這對於活動的設計及實施具有參考意義。

模式 3 的分析結果說明了「商校協作」有助弱勢學生找到動力和途徑實踐目標，但不得對學生本身的發展處境有更清楚的掌握，原因是愈就近學生生活的處境（尤其是家長期望及參與的因素），影響力愈大。事實上，若了解家長對學生的影響，甚至可考慮將家長納入為「商校協作」活動的支援對象，建議籌劃「商校協作」活動時加強家長這方面的信息。

此外，從分析可見，「女生」在三個模式中均呈負面影響，這跟 Snyder, Lopez, et al. (2003) 和後來學者（如 Otis et al., 2016）指希望感無顯著性別差異不符。研究團隊估計這正突顯 Nurmi (1991) 所提出文化差異的影響，一方面是香港社會仍很大程度承傳華人傳統文化價值，另一方面受訪學生當中內地移民仍佔一定比例，或令受訪女性學生在達至個人目標的動力和途徑方面感覺受到限制。本研究首兩位筆者曾與其團隊針對參與「起動計劃」的學生進行了另一項有關生涯規劃的研究（何瑞珠等，2015），提出需要向女性弱勢學生作出更大的賦權和支援，本研究在此提出相同建議。最後，「商校協作」活動如何提升參加者的希望感，是值得深入了解的課題，將來進一步分析可考慮更前沿的分析方法（如結構方程模型）以了解參加者如何透過不同類型的「商校協作」提升其希望感；另外亦可繼續進行追蹤研究及訪談，更深入了解參加者的希望如何得以實現。

鳴謝

本研究獲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計劃編號：14626416）和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學校起動」計劃資助。

註釋

1. 本文根據第九屆兩岸四地「學校改進與夥伴協作」學術研討會中〈「商界－學校」協作：培育學生面對挑戰的正面素質〉一文改寫。
2. Snyder 等人（Snyder, Harris, et al., 1991; Snyder, Shorey, et al., 2002）對希望感和其他正向心理素質有更詳細的區分，在此不贅。
3. 「組別」指「收生組別」。根據目前香港中學中一新生派位機制，全港升讀中一的學童會按考試成績由高至低排列。「第三組別」學生為成績最低的三分之一。這些學校的學生多來自社經地位較低的家庭，在學習動機和行為紀律方面往往需要較多關注。
4. 2015 年，「起動計劃」的學校數目拓展至 50 所中學，參與協作的企業、大專院校及各類型機構共 35 所。

參考文獻

-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15）。《香港的社會流動》。擷取自 <http://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415rb02-social-mobility-in-hong-kong-20150112-c.pdf>
- 何瑞珠、姜培芝、楊鎮偉、李文浩（2015）。《「商界－學校」協作：裝備香港弱勢學生升學就業技能》。《教育學報》，第43卷第1期，頁153-177。
- 政府統計處（2012）。《2011 人口普查》。擷取自「人口普查互動數據發布服務」：<https://www.census2011.gov.hk/tc/index.html>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3）。《2012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擷取自 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pdf/2012_Poverty_Situation_Chi.pdf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2010）。《香港僱員正向心理調查研究報告》。擷取自 <http://www.fourdimensions.org/news/2010/20100117-rpt.pdf>
- 曾榮光（首席研究員）（2004）。《推行〈中學教學語言指引〉之評鑑研究：1999 年至 2002 年》。香港，中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 黃顯華、韓孝述、李文浩（2012，9 月）。《「大學－商界－學校」協作在前期發展階段的特色：以職場參訪活動為例》。論文發表於第六屆兩岸四地「學校改進與夥伴協作」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
- Bolland, J. M. (2003). Hopelessness and risk behaviour among adolescents living in high-poverty inner-city neighbourhood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6(2), 145–158. doi: 10.1016/S0140-1971(02)00136-7
- Callina, K. S., Johnson, S. K., Buckingham, M. H., & Lerner, R. M. (2014). Hope in context: Developmental profiles of trust, hopeful future expectations, and civic engagement across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3(6), 869–883. doi: 10.1007/s10964-014-0096-9
- Cavazos, J., Jr., Johnson, M. B., & Sparrow, G. S. (2010). Overcoming personal and academic challenges: Perspectives from Latina/o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Hispanic Higher Education*, 9(4), 304–316. doi: 10.1177/1538192710380744
- Chang, E. C., & Banks, K. H. (2007). The color and texture of hope: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for hope theory and counseling among diverse racial/ethnic group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13(2), 94–103. doi: 10.1037/1099-9809.13.2.94
- Chang, E. C., & DeSimone, S. L. (2001). The influence of hope on appraisals, coping, and dysphoria: A test of hope theory.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2), 117–129. doi: 10.1521/jscp.20.2.117.22262
- Curry, L. A., Snyder, C. R., Cook, D. L., Ruby, B. C., & Rehm, M. (1997). Role of hope in academic and sport achieve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6), 1257–1267. doi: 10.1037/0022-3514.73.6.1257
- Fleeson, W., & Nofle, E. E. (2009). In favor of the synthetic resolution to the person–situation debat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3(2), 150–154. doi: 10.1016/j.jrp.2009.02.008

- Geffken, G. R., Storch, E. A., Duke, D. C., Monaco, L., Lewin, A. B., & Goodman, W. K. (2006). Hope and coping in family members of patients with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 20*(5), 614–629. doi: 10.1016/j.janxdis.2005.07.001
- Leung, J. T. Y., & Shek, D. T. L. (2011). Expecting my child to become “dragon” —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arental Expectation on Child’s Future Sca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Disabili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10*(3), 257–265. doi: 10.1515/ijdh.2011.043
- Marques, S. C., Pais-Ribeiro, J. L., & Lopez, S. J. (2009). Validation of a Portuguese version of the Children’s Hope Scale.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30*(5), 538–551. doi: 10.1177/0143034309107069
- Marques, S. C., Pais-Ribeiro, J. L., & Lopez, S. J. (2011). The rol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constructs in predicting mental health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two-year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2*(6), 1049–1062. doi: 10.1007/s10902-010-9244-4
- McCabe, K., & Barnett, D. (2000). First comes work, then comes marriage: Future orientation among African American young adolescents. *Family Relations, 49*(1), 63–70. doi: 10.1111/j.1741-3729.2000.00063.x
- Ng, E. C. W., Chan, C. C., & Lai, M. K. (2014). Hop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underprivileged children in Hong Ko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community support.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42*(3), 352–364. doi: 10.1002/jcop.21614
- Nurmi, J. E. (1991). How do adolescents see their future?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orientation and planning. *Developmental Review, 11*(1), 1–59. doi: 10.1016/0273-2297(91)90002-6
- Nurmi, J. E., & Pulliainen, H. (1991). The chang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elf-esteem, and intelligence as determinants of orientation to the future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4*(1), 35–51. doi: 10.1016/0140-1971(91)90044-R
- Ojeda, L., & Flores, L. Y. (2008).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generation level, parents’ education level, and perceived barriers on the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of Mexican American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57*(1), 84–95. doi: 10.1002/j.2161-0045.2008.tb00168.x
- Otis, K. L., Huebner, E. S., & Hills, K. J. (2016). Origins of early adolescents’ hope: Personality,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stressful life events. *Canadian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31*(2), 102–121. doi: 10.1177/0829573515626715
- Schmid, K. L., & Lopez, S. J. (2011). Positive pathways to adulthood: The role of hope in adolescents’ constructions of their futures. In R. M. Lerner, J. V. Lerner, & J. B. Benson (Eds.), *Advances in child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Vol. 41: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pp. 69–88).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Elsevier.
- Seligman, M. E. P., & Csikszentmihalyi, M. (2000). Positive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 5–14. doi: 10.1037/0003-066X.55.1.5

- Snyder, C. R. (1994). *The psychology of hope: 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Snyder, C. R., Harris, C., Anderson, J. R., Holleran, S. A., Irving, L. M., Sigmon, S. T., ... Harney, P. (1991). The will and the way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individual-differences measure of hop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4), 570–585. doi: 10.1037/0022-3514.60.4.570
- Snyder, C. R., Hoza, B., Pelham, W. E., Rapoff, M., Ware, L., Danovsky, M., ... Stahl, K. J. (1997).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hildren's Hope Scale. *Journal of Pediatric Psychology*, *22*(3), 399–421. doi: 10.1093/jpepsy/22.3.399
- Snyder, C. R., Lopez, S. J., Shorey, H. S., Rand, K. L., & Feldman, D. B. (2003). Hope theory, measurements, and applications to school psychology.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18*(2), 122–139. doi: 10.1521/scpq.18.2.122.21854
- Snyder, C. R., Shorey, H. S., Cheavens, J., Pulvers, K. M., Adams, V. H., III, & Wiklund, C. (2002). Hope and academic success in colleg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4*(4), 820–826. doi: 10.1037/0022-0663.94.4.820
- Wang, L. F., & Heppner, P. P. (2002).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arental expectation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on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0*(4), 582–608. doi: 10.1177/00100002030004006
- Vela, J. C., Lerma, E., Lenz, A. S., Hinojosa, K., Hernandez-Duque, O., & Gonzalez, S. L. (2014).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familial factors as predictors of Latina/o students' hope and college performance.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36*(4), 452–469. doi: 10.1177/0739986314550790

Family Involvement and School-Business Partnership: Nurturing Students' Hope

Esther Sui-Chu HO, Antony Man-Ho LI, & Thomas Sze-Kit LEE

Abstract

When stepping into senior secondary years, Hong Kong students are faced with different challenges, especially academic stress and competi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Without the qualities necessary for coping with challenges, they may lose the goals and motivation for solving problems and even the hope for future. This is of particular concern to disadvantaged students who are lacking in socioeconomic resources and family support. Nowadays, activities for promoting students' personal development have been organized or supported by family involvement and school-business partnership in Hong Kong.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student and family background factors (gender, place of birth, family structure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parental expectation and involve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school-business partnership activit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hope.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2015 taken part by over 5,500 secondary students, who were participants in a school-business partnership program, and was analyzed by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arental expectation and involve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school-business partnership activities show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students' hope scale. By analyzing the effect of participation in school-business partnership activities by disadvantaged youths on their development of hope — a positive quality for forging the future, this study provide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n how youth policy may tap into the resources provided by enterprises and the community.

Keywords: parental involvement; school-business partnership; disadvantaged students; positive psychology; hope

HO, Esther Sui-Chu (何瑞珠) is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LI, Antony Man-Ho (李文浩) was School Development Officer in the Quality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 is Assistant Project Director of Bei Shan Tang Foundation, Hong Kong.

LEE, Thomas Sze-Kit (李仕傑) is Research Assistant in the Hong Kong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